

王蒙
精选集

世纪文学经典

SHIJI WENXUE

JINGDIAN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shiji
wenxue
jingdian

世纪文学经典

王蒙 著

王蒙精选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蒙精选集 / 王蒙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5.9

ISBN 978-7-5402-3957-2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8954 号

王蒙精选集

王蒙 著

责任编辑 / 张红梅 王 滢

装帧设计 / 小 贾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5 字数 410,000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书系总策划：

白烨、陈骏涛、倪培耕、贺绍俊、张红梅

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评选专家名单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丁 帆 |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王中忱 |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王晓明 |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王富仁 |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白 烨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孙 郁 |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|
| 吴思敬 |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陈思和 |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陈晓明 |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陈骏涛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陈子善 |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孟繁华 |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|
| 於可训 |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杨匡汉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杨 义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张 炯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张 健 |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|
| 张中良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赵 园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| 洪子诚 |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贺绍俊 |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|
| 谢 冕 |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程光炜 |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|
| 雷 达 |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|
| 黎湘萍 |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|

出版前言

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书系的创编与推出,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,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,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,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。

为使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书系的评选、出版活动,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,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,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,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,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。其后,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评选委员会,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,以得票多少为顺序,产生了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的专家评选结果。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,我们与“新浪网·读书频道”全力合作,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“华文‘世纪文学 60 家’全民网络大评选”活动。2005 年 12 月 16 日,读者评选结果在“新浪网·读书频道”正式公布。为了使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的评选与编选,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,经过反复协商,最终以各占 50% 的权重,得出了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书系入选名单。

“世纪文学 60 家”书系入选作家,均以“精选集”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。在作品之外,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、学者撰写了研究性序言,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,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、创作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。

国文学由浪漫的崇高,向多元的杂色的过渡,仅此一点,他便获得了一种“史”的意义。倘若了解共产主义文学精神在中国被解构的历史,王蒙提供给人的信息,比他同代的任何一个作家,都要丰富,都要多姿多彩。

无疑,王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。他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,也不似先锋派艺术家那么孤独、超然。他身上折射着太复杂的因素:政治的、文化的、艺术的……从50年代的右派作家,到自我放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;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突起,到上任文化部长的要职;从自动退居到逍遥地以写作为生,四十年的岁月沧桑,使他成为共和国文化变迁史的一个标本。阅读王蒙必须学会宽容与忍耐,他不会给你一个确切性的精神话语,他过于机智、聪慧,心灵深处是不羁的热情和俏皮式的反讽。他展示的是另一种的人生,那种对苦难的态度,对恶的态度,对纯粹与永恒的态度,都远远不同于他的父辈,亦有别于他的下一代。他的背景、地位、创作实力,使他成为当代少有的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人生的文人。他的每一篇评论,和每种重要言行,都被世人看成了代表什么,“动向”了什么,他渐渐地成了中国文坛“权威话语”的代言人,其语惊四座的咏叹,常常成为被关注的中心……

无论这一现状他自己是有意还是无意,他赢得了自我,但又常常坠入尴尬。他抵挡了什么,抗拒了什么,但同时又被抵挡着,抗拒着。他好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但同时又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。我在写茅盾的时候,常常想起王蒙,在这一点上,他们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文学史上这一现象的延续,是不是可以使人看到文化人内心最隐秘的苦衷?理解王蒙并非易事,不懂得政治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在文人身上复杂的投影,我们对他的单一的情绪化的判断,都会失之偏颇。

我准备尝试一下,我相信与他的对话不能停留在单纯的价值判断上。

20 世纪 80 年代初,读王蒙作品的时候,我曾惊异于他的恢宏、高亢、洒脱的境界。那时候,当代的作家,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,给人以那么动人、神异的感觉。他写新疆牧场,写右派,写青年“布尔什维克”,使人看到了民族生活复杂的历史。我也正是通过他的文字,认识了 50 年代,认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后知识分子的命运。王蒙的情感是饱满的,苏联文学中的理想精神,与中国“布尔什维克”的苦难意识,那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。在王蒙那里,很少极其私人化、个体化的自语,这使他显得较为大气。他对个体生命的审视常常透出凝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。《蝴蝶》《春之声》《风筝飘带》《杂色》《如歌的行板》等,并不是以故事取胜,流动在那里的,是诗化的哲思、苍凉而奔放的交响。我觉得他生命的状态是大气与朗然的,那些闪着光泽的迷宫般的语句,把人拽向混沌、高远而神圣的领地。他怎么那样富有激情和想象力,在历史的苍茫与个体的微凉间,不是将己身引向灰谷、死灭,而恰恰是彼岸与未来?我在王蒙那儿期待到了一丝丝不绝的亮色。他作品中汨汨涌动的想象,把无奈与崇高,浑然地置于同一个调色板上。但那时他的文字纯粹多于混杂,明快高于抑郁,虽然常可以从中听到颤音,但它的雄厚气息,似乎把绝望、伤感的影子遮掩掉了。

从来没有一个当代作家,在那时明确地把“意识流”引入文坛,王蒙撕毁了流行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叙述模式,将一种杂色,掺入了艺术领域。

新时期文学在文体上的自觉,与精神内省的自觉方面,应当说始于王蒙。

这个贡献使他成为那一新的时期文艺革新的带头人。虽然这一革新还是浅层的,但它为文坛后来大规模的艺术解构,创造了前提。

但很难说王蒙的发现与创造是来自深入的文化思考。他没有一

套系统的文艺理论,他的全部创造力,来自于他心灵的感觉,自由的意志。他的心灵深处的冲动所散出的热力,比那同时代的许多理论家,要生动得多,丰富得多。阅读王蒙的文字,总难忘于他那汪洋大海般的激情,它永远在涌动着,澎湃着,没有静谥与恬淡。《青春万岁》是他十九岁时的产物,那时便可以看到他奔放不羁的个性了。直到1979年从新疆返回北京,他依然带着青春岁月的余痕。我一直认为作者结构故事不如其抒情笔致,他并不在意人物情节的离奇怪诞,而是要自由而潇洒地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。这一状态,使他无意中消解掉了理性主义模式,从而也使他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。

革命理想、殉道意识、忘我精神、狂热的崇尚理性,这是早期王蒙世界核心的东西。我绝对相信这一切均是真实的。十五岁参加革命,变成地下共产党员,二十岁,成为北京东四区团委的领导人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,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年代。共产党的革命风风火火,王蒙便卷入了这一历史的洪流中。他曾甜蜜地回忆道:

在建国初期,也许可以说是我们共和国的童年吧,节日的游行、阅兵和焰火晚会曾经怎样地激荡着人们的心!一进入九月份,国庆的准备工作已经使许多年轻人睡不着觉了,应该抬着怎样的图表和模型去向祖国汇报呢?应该穿哪一件毛衣、哪一条裙子来表达我们新中国的新一代的幸福和欢欣呢?要走什么样的步子,做什么样的动作,摆什么样的姿势让毛主席来检阅我们的精神面貌呢?一想起这些,我们简直兴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我们本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,本来是“东亚病夫”,本来是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,本来是男人的长辫、女人的小脚、又麻将的官员和抽鸦片的兵将……我们充满了悲愤,高唱着“团结就是力量”,去“向着法西斯蒂开火”,去迎接黎明。……多少先人望枯了双眼,多少烈士梦断了魂魄,终于,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进军中,在

军歌和腰鼓声中到来了，中国的天空，从此永远是“解放区的天”、“明朗的天”，到处是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到处是和时
间赛跑的工农，是最可爱的人……而且有游行。在一盘散沙、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废墟上，巨人般的新中国已经神速地挺起了腰！看天安门前吧，鲜花、红旗、气球、和平鸽、笑脸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一个口号表达着亿万中国人民的心，亿万中国人衷心喊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口号。年富力强的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总司令……向着人民招手。“人民万岁！”毛主席呼道。这样的景象可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和可能有的吗？还有阅兵，喷气式飞机、火箭炮和坦克，海、陆、空三军，那时候，甚至连坦克排出的瓦斯吸到肺里似乎也是香甜的，这是几千年来，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强大武装、自己的装甲部队啊！入夜，探照灯的光柱交织在首都的上空，缤纷绚烂的礼花在我们的头顶上绽放，高音喇叭里播送着各民族的舞曲。也许，这些舞曲里最令人难忘的是新疆的迎春舞曲吧？多多多多拉多拉，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……太阳一出来，赶走那寒冷和黑暗！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来运送参加晚会的人民。快一点去，快一点站在圈子里，和你周围的男男女女拉起手来吧，我们都是亲人，都是同志，都有共同的欢乐和信念。

那是 20 世纪中国大狂欢的日子，我至今仍从自己的父辈那里，感受到昔日的余温。王蒙正是在那时，接受了圣火。他的生命的天幕被照亮了。读一读他晚年写下的长篇小说《恋爱的季节》，便会感到那段岁月的脉脉情致。晚年王蒙回首往事的时候，虽然掩不住苍然之色，但对已逝的旧梦，还多少带有绵绵眷恋吧？这是他生命的底色，没有这种理想主义时代留下的“纯粹”，就不会有后来的王蒙。在社会变革的风潮中释放自己的生命欲求和永恒的梦想，这是他，以及他那一代许多“布尔什维克”共有的人生追求。

三

但1958年的右派帽子,使他的狂热第一次受到冲击,直到去新疆与少数民族的农牧民们生活在一起,在边陲整整生活了十六年以后,他才从另一个角度,懂得了生活。王蒙思想上的成熟,应当说是从新疆那里开始的。他从底层人的苦难中,意识到了什么、感悟到了什么,他的理想主义、入世的儒家情感,开始饱受着风雨的袭侵。但王蒙之于新疆,与张贤亮、从维熙那些右派之于农场,并不能相提并论。我一直把此行看成他自我“放逐”。独闯新疆,其实对他意味着一种浪漫的逍遥,他其实是为了寻找一种生命的诗意,才到那里的。新疆拯救了王蒙,他后来说:“不能简单把我去新疆说成是被‘流放’。去新疆是一件好事,是我自愿的,大大充实了我的生活经验、见闻,对中国、对汉民族、对内地和边疆的了解,使人有可能从内地——边疆,城市——乡村,汉民族——兄弟民族的一系列比较中,学到、悟到一些东西。对于去新疆的干部、作家、群众……都对我很好。”读那一代右派文人的作品,大多是凄怨、残酷的,那是沦为底层的中国知识分子悲惨的歌哭。而王蒙完全是另一种调子。苦难成了他的财富,他从不神经质或孤独地自言自语着。王蒙的小说中总奔涌着滚滚的生命热力。他将忧郁、多难的历史变成激越澎湃的如歌的行板。在他最感伤的叙述背后,似乎总有一种期待,一种自救,一种洒脱的逍遥。他从不哭哭泣泣、哀哀怨怨地说:我痛苦极了,我绝望极了,我不能活了。王蒙以明快的幻想和狡黠的自嘲,超越了以往小知识分子的烦恼。读他的文字,不能不惊叹于他的达观与豁然,他习惯于自由地抒发胸臆,并不愿陷入狭窄的痛感的吟哦里,写作对他意味着“为了心灵的自由驰骋,为了把哭、笑、痛苦、嘲笑、思索、爱情、平静、宽恕和自信写它个淋漓尽致”。这是自由的心态,是老庄、李白、普希金、法捷耶夫以来,一切显示大气的文人所共有的心态。王蒙承认自己是热爱生活的人,知其不可而为的儒家通达、乐天精神深深地影响

了他的人生，他在知识世界里给人的东西是有限的，但他的生命状态、思维方式乃至语言表达方式，时常给人以惊奇与爽然的一笑。王蒙最初吸引我的，便是这种诡谲幽默、汪洋恣肆的情致。他渐渐学会了超然于象外，学会了以多样性、复杂性、广博性来驱赶心灵的寂寞。我觉得他的这种选择是机智和聪慧的，但他既获得了心灵的抚慰，又因为过于圆滑而失去庄重。一切选择都将付出代价，王蒙在精神的跋涉中，既找到了归宿，又渐离了故有的家园。

选择了杂色作为自己世界的主调，既有与现实妥协的一面，但更主要的，还是对存在的宽容与理解吧。我注意到他对各层次人的态度，注意到其作品中的党员、干部、农民、知识分子诸种形象，他似乎能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意义，虽时常夹带反讽与幽默的调侃，但他不拒绝众生，在他骨子里，与生俱来地具有一种热情、好奇、理解他人的东西。在新疆的十六年，他一方面承受着政治阴影下的压力，但更多的，还是在底层获得了生活的快意。阅读那些关于新疆岁月的回忆文字，我感到他诗意的享受和无边的眷恋。他将新疆称为“在孤独的时候给人以温暖，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，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，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，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、新的乐趣、新的知识、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”。王蒙内心深处的迷茫，常常化解在异地乡俗的迷人的情境里。他在世俗中发现了美，在朴素、自然、开阔的民风中找到了快意。他从民间的自娱中，找到了超越苦难的精神之光。他学会了奔放热情，“自唱自调，如入无人之境”的洒脱。也许，在苦难中跋涉的人，最渴望的是了解、默契、知心，王蒙在“他”的世界里，好像找到了这一切。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，大多都在找一个寄托。刘绍棠有他的“运河”，浩然有他的乡土，王蒙呢，有他的理念、他的新疆、他的“布尔什维克”队伍。读这一代人的作品，绝没有“无根的漂泊”的苦涩。在他们那里，“上帝”还没有死，因此，即使像王蒙那么“新潮”，但也绝看不到鲁迅、萨特式的绝望。王蒙曾眷恋过头上的星空，也眷恋过脚下的大地，而更深切的，是眷恋着生命的本体。他永远不会自虐，不会孤芳自赏地躲在书

斋里。他时时关切着远方的人们,关注着与自己休戚相关的实在。在经历了多种厄运之后,他学会了忍耐、大度,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人生,发现美。例如,回忆边疆生活的时候,他叹道:

骂“村干部”之风源远流长。至少国民党时候就骂,流风余音至今不止。但谈起“村干部”来,我总替他们有点叫屈之感,他们不容易。记得那时有一句俗话,说这些农村干部是春天的红人(择优选中),夏天的忙人(当然),秋天的穷人(拿什么分给社员们呢)、冬天的罪人(冬天搞运动,他们自然是“运动员”)。我特别同情他们,可能是因为我毕竟与他们朝夕相处,同流共事过吧。

许多从右派生活走过来的人,都未这样以同情的目光写过“干部”。王蒙早期的单一思路,在现实面前崩解了。现存世界决不像感伤主义文人理解的那么简单,王蒙相信世界由杂色组成的。那里有黑暗、有陷阱、有美丽、有庄严。但他在那里发现了梦想。他相信人可以在混浊、灰暗的时空中以搏杀、探索而找到升华自我的道路。与那些拘于风花雪月的琐屑的文人比,他拥有了一种磅礴的气度,而这一点,正是许多文人所不具备的。

四

王蒙在本质上是诗人气的,但他特殊的经历,使他温和、坦然的个性里,迸射着一种复杂的情感。我觉得他是较了解中国国情的少数文人之一,他几乎感受过各个层次人的生活,对世相种种、官场种种、文人种种均有相当的了解。一个深味世态的人,常常不会以一只眼睛打量世界,他越来越感到生活的荒诞、文化的荒诞、存在的荒诞。于是他出语讥人、圆滑幽默,他调侃戏弄世间也调侃戏弄自己。于是有人说他官腔、世故、无节操……其实王蒙在内心深处有着深切的忧

患,不过表现方式过于闪烁而已。我常常在他那里感受到一种沉重,一种无言的哀凉。也许,世人对他的许多批评是对的,比如圆滑、中庸等等,但倘看不到他埋在“魔术师”下面的无奈、悲愤,大概也难走进他的世界。

《活动变人形》是王蒙较为成功的作品,我在这里看到了鲁迅的某些影子。他对老中国儿女劣根性的洞悉是入木三分的。在人性的世界里,他看到了那么多的丑陋、阴暗,早期记忆中的苦涩,差不多都涌到了笔端,我相信他深味市井世界最残酷的东西,看他写人的尖酸刻薄,已能感到内心的沉重。但他很少把自己燃烧在作品里,他往往跳将出来,以居高临下的目光,抽打着芸芸众生。在那一组组可恶的画面里,我读出了杂文笔法、相声段子、魔术师的诡笑。他不是托尔斯泰,所以不真诚地忏悔,不乞求上苍;他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,所以难见非理性的自语和灰色的痉挛;他也不是鲁迅,所以在最绝望之中不会孤独地肉搏惨淡的暗夜。王蒙的世界是驳杂的,他在依恋中绝望着什么、在达观中哀伤着什么,他把幽默与严肃、通俗与含蓄、崇高与凡俗和谐地杂糅在一起。他失望于国民劣根性的鄙琐,但却不是直面前行,而是峰回路转。《活动变人形》对中国人性中丑陋的、无可救药的性格的批判,已显示了他的这一审美风格。在对国民精神深层因子打量的那一瞬,他不自觉地汇入了鲁迅传统。但他的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调子并不是沉郁的,在他的笔下,可以聆到一种鲜活的声音,至少“叙述者”本身饱含的激情,常可以把小说的忧郁驱走。

这是王蒙式的机智,我从未将其作品看成是纯粹的艺术来读(如对待沈从文、汪曾祺那样),王蒙从不会给你闲适中的回味、咀嚼,不会像清风一样把你吹到过去,吹到田园之中。他那儿总疏散着对现实、对人生的理性精神,疏散着鲲鹏展翅扶摇直上的人间情怀。读王蒙,我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心理状态和审美状态,那种纷至沓来的意象,酣畅淋漓的抒怀,与阴郁、单一、萎缩的国民性格,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!王蒙的世界比乡土艺术多了开阔,比市井文学多了野

性,比感伤的诗作多了热情,比凄怨的夜曲多了些亮度。王蒙是粗糙的、感觉的、无雕虫小技而多逍遥之咏,虽伤痕累累,捉襟见肘,但他的吞云吐月、纵横捭阖的气魄,是“五四”新文学以来少有的景观。

王蒙的诱人在于他的存在状态,以及他的理性达成方式。我以为看他有关政治、文化、艺术的思考的文字,比其小说写作更具趣味。他对国民性问题、知识分子问题、历史问题、艺术创作问题的见解,都影响着文化的进程。中国有无数的教授、学人,却很少有人像王蒙那样,直接以自己的思想,推动一种风气的流行。王蒙在解构着一个时代,同时又在为建设着一个新的文化奔忙着,这一点意义,已超过了小说写作的自身。他不执着于一个主义、一种观点,对虚幻性与实在性,有着较清醒的态度。他把幻想由天上还原到地面,又把世间之乐推向天空。王蒙在微笑在颠覆着自己的昨天,颠覆着他曾认可、曾履行的事业。他对旧物很少决然的离别,而是温吞的告辞,例如对毛泽东的态度,对“费厄泼赖”缓行与否的态度,对“躲避崇高”的态度,都是温和而平淡的。他在以肯定的方式否定过去,而不是以否定的方式去建设或肯定什么。例如对“人文精神”的思考,对王朔现象的思考,对“不争论”的思考,几乎看不到一丝独断主义的影子。在一篇文章中,他说:“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,包括老庄的辩证法,黑格尔的辩证法,革命导师的辩证法;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。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罗罗,抱残守缺,耍丑售陋,自足循环,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。”这看似老奸巨猾的变通,实则是对自己的历史、民族的历史反思后无奈的选择。他讥讽“红卫兵情结”与封建余绪时,是何等语重心长,但对自我深层的东西与文化母体结症的东西,便不免闪烁其词,在心灵深处,还留着一块园地。在这个园地里,他以幽默支撑着空间,他以“从容”“平等”“超脱”“游刃有余”“聪明透彻”消解着拘谨、失态、仇视、绝望。王蒙的境界确是超出了常人,说其虚伪、假态、失节,都难以规范其内心形态,我认为在他的世界里,交织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妥协、平民与贵族的妥协、本土与域外的妥协……中国现代文化的挫折感被他重新调节到一种开放、

宽容、多元的态势里。以此来重塑国民性格，在他看来，是不得已的现实选择。

五

但这一选择是痛苦的。他时常陷入“左”、右两种势力的夹击，消失了“纯粹”与“确切”的王蒙，不会得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认同。这使我想起胡适晚年的处境，当一种平和、自由主义的文人用建设性、理解性、兼容性的思路构建新的文化形态时，当这个民族恰恰缺少建设性、理解性、兼容性的传统的时候，其提倡者的路，是可以想见的。我赞同他对“红卫兵情结”的批评，赞同“对王朔的理解”，他对“人文精神”讨论中的偏执性因素的指责也是中肯、深刻的。但他的“左右逢源”式的话语方式，激怒了成千上万的文人。在“不合理”“不健全”还司空见惯的年代，居然有毁灭“崇高”和“理想主义”的论调，王蒙是不是成了“渐入颓唐”的老人？王蒙的境遇不免苍凉，他受到各种势力的挤压、误解、痛恨、围剿……他似乎陷入了独战的苦痛。

我从他的许多文字中，可以依稀体味到这种苦境。他的文章不免也流出了寂寞之感。他对毕加索的感应，对嵇康、阮籍的理解，对曹雪芹的共鸣，那其间，便有难言的感叹吧？《名士风流》一文叹息“士”的无奈，其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影子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遭受的连连抨击，正是他的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。他已深深尝到围剿、中伤的疼痛。围绕《坚硬的稀粥》那一场官司，王蒙似乎有些被激怒后的失态。中庸、宽容对他并不容易。中国文化是向来难容第三种选择的，苏纹当年欲做“第三种人”时，不是也遭到四面的夹击的压力？在一定意义上讲，王蒙的境界是超前的，在世人均讲艺术的功利性或非功利性时，他则展示了艺术多元功能的可能性；在世人慌慌然寻找新理想主义的时候，他说出躲避崇高的价值；在人们纷纷崇拜域外文明、“精英”化贵族化的时候，他却肯定了中土的某些世俗文明……我相信一个健康的民族应当具有王蒙这样的胸怀。然而，不

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王蒙的背景、王蒙的视野、王蒙的先觉条件。当他居高临下地直陈胸臆的时候,无数在底层挣扎、困顿的文人觉得王蒙正走向贵族,他正代表着贵族宣读着平民难以忍受的信条。在腐败、堕落尚未根除时,难道不需要理想与节操?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边缘化时,难道不应高唱人文主义的歌调?人们对王蒙的抱怨,正如当年“左联”对梁实秋的抱怨。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左翼文化不相信“永久的人性”,王蒙不幸在晚年扮演了“超意识形态”的“永久的人性”鼓吹者的角色。我相信这位前文化部长与自己的对立面水火难容,这是两个不能对话的世界,它无法构成统一的话语场。煤油大王不会懂得捡煤渣的穷人的苦乐,而王蒙所期待的,是捡煤渣者也应有的煤油大王的生活。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,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使自己不再是无产阶级,王蒙不幸先走了一步,而后面的人却把他视为远行的叛徒。当他看到爱于斯、恋于斯又恨于斯的同营垒者背离而去的时候,我似乎感受到他内心的苦寂。丰富的智慧是痛苦的,他的自言自语中,似乎响着一丝孤傲的哀凉……

鲁迅当年形容自己曾陷入无物之阵,在孤独前行的时候,四面是灰土、灰土……周作人也谈及这一感受,当“左派”、右派均说他不好的时候,他竟大谈起草木鱼虫。绝望的反抗者如鲁迅,宁静超然的自娱者如周作人,其实都在为高山流水知音少而沉默。王蒙晚年的尴尬,便有这类的苦涩吧!我相信他的选择比激进主义、保守主义更具风险,这是他的价值世界必然的规范。如果不是背负着对一个民族的责任,对一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责任,他完全可以成为单纯的逍遥派或反对派。但他是新式的“布尔什维克”,他既要保存自我,又要发展社会,既要坚持什么,又要放弃什么,他不会彻底地放逐自我,走向人性的荒野。因为这个世界还需要温情,需要游戏,需要友爱。王蒙的复杂性正在这里,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,都留在了他的世界中。我从他那里看到了革命的神圣与非革命的洒脱,精神的放浪与道德的守望。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代的文化矛盾,都弥散在他的艺术空间里。他想拆卸什么、修补什么,在两难的困境里,他

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园地。

王蒙身上牵扯着真谛与俗谛的长影，从共产主义到非共产主义，从殉道精神到平民乐趣，这种不和谐的旋律在他那儿竟和谐了。一个杂色的世界会拯救我们吗？王蒙的选择具有可行性吗？他会不会像茅盾那样，也走向深深的寂寞的命运？这恐怕连他也无法回答吧。